

卓吾先生批評忠義



學苑出版社

長尺而斤囊直交

共太討其走妖魔

詩 明 清 小說的文化審視

絳幘

卷一 幸時

前之

九天閭闔

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

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佩聲歸到鳳池

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

子駕坐紫宸殿受百

祥雲迷鳳閣瑞氣

皋于厚 著

御柳拂旌旗帶露宮

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

皋于厚 著

学苑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本书由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皋于厚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ISBN 7-80060-379-2

I. 明… II. 皋…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632 号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8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she@163.com

邮购电话: 010-67674856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安源印刷厂

开本印张: 890×1240 1/32 开零 14.25 印张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上编 总论

第一章 明清时代的进步思潮与小说中的人文精神	(3)
一、贬君叛道	(4)
二、扬情抗理	(12)
三、倡真反伪	(21)
四、崇实黜虚	(27)
五、几点结论	(31)
第二章 明清小说的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	(36)
一、王道仁政理想与救世英雄	(36)
二、改良主义思想与补天英雄	(42)
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自由人格	(52)
四、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的成因与发展趋势	(58)
第三章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吏治思想	(66)
一、识贤佞而除弊端	(69)
二、崇才智而贬昏庸	(80)
三、斥贪暴而尚清廉	(89)
四、严治吏而仁待民	(99)
第四章 明清小说风俗描写的特点与文化意蕴	(109)
一、风俗描写的功能	(111)

二、风俗描写的特点	(122)
三、风俗画的文化意蕴	(132)
第五章 古代小说的“寓言化”特征与深层意蕴	(140)
一、寓言和寓言体小说	(141)
二、寓言色彩和寓言化倾向	(145)
三、托寓性和讽喻性	(149)
四、寓言化的艺术技巧	(154)
第六章 明清小说传播方式与叙事方式的演进	(163)
一、“说—听”的传播方式与“写—读”的传播方式	(164)
二、重主观讲述与重客观显示	(169)
三、“情节小说”与“性格小说”	(175)
四、诗词韵语的简约化与精致化	(178)
第七章 审美观的发展与明清小说戏剧化特征的演进	(182)
一、古代小说、戏曲的互融与互渗	(182)
二、传统审美观与小说戏剧化的基本特征	(186)
三、审美观的更新与小说的戏剧化演进趋向	(198)

下编 分论

第八章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现实关怀”和平民意识	(211)
一、现实关怀精神	(211)
二、“平民化”的思想倾向	(224)
三、审美特征：虚实雅俗之间	(232)

第九章 明清神魔小说的人世情结与批判精神	(246)
一、神魔小说发展的三个时期	(249)
二、世俗化倾向与人世情结	(258)
三、批判意识与叛逆精神	(265)
四、新的审美思潮推动下的艺术新变	(270)
第十章 叛逆意识与忠君意识的悖反	
——侠义小说的思想矛盾与文化内涵	(276)
一、长篇侠义小说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276)
二、侠义公案小说的时代特征	(284)
三、惩恶除暴、复仇报恩与警世	(292)
第十一章 明清公案小说的文化精神	(301)
一、明代文言公案小说的“俗化”倾向	(302)
二、书判体、传记体公案小说与清官崇拜	(304)
三、拟话本公案小说：明末市井生活的镜子	(313)
四、《聊斋》公案小说的思想意蕴	(325)
五、清代公案小说的探索与开拓	(333)
第十二章 从文人心曲到市井情愫	
——明代传奇小说的文化特征	(341)
一、《剪灯新话》与元明之际的文人心态	(341)
二、《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思想倾向之比较	(346)
三、明代后期传奇的世俗化倾向	(353)
第十三章 《韩湘子全传》所反映的社会心理与宗教意识	
.....	(360)
一、韩湘子故事的流传与衍变	(360)

二、天府仙界与世俗凡尘的交融叠现	(364)
三、批判精神和宗教意识的二重交织	(367)
第十四章 《儒林外史》的文化意向	(373)
一、“真儒”形象的文化内涵	(373)
二、对精神病患的剖析与对灵魂挽救的思考	(382)
三、祭泰伯祠的文化意向	(391)
第十五章 《红楼梦》与道家文化	(405)
一、刺世疾邪的批判精神	(410)
二、恣情任性的自然人格	(415)
三、人生失落的梦幻意识	(428)

上编 总 论

第一章 明清时代的进步思潮 与小说中的人文精神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封建社会全面崩溃的时刻虽然尚未来临,但已进入内部的自我批判阶段。明代中叶以后,商业、手工业在一些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部分部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重视实利的市民价值观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农民、市民的起义和暴动,明清鼎革的沧桑巨变,儒学中反正统的异端思想的抬头以及中西文化的初步交流与碰撞,所有这些都为新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涌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明代中叶以后,思想文化领域先后出现了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潮、批判封建禁欲主义的个性解放思潮以及批判空谈性理的经世致用思潮。这三大思潮都带有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明清小说的优秀作家们比较敏锐地洞察了历史发展大潮的起伏跌宕,他们借小说寄怀抒愤,通过艺术描写表达自己对时代的感受,为时代进步思潮推波助澜。他们同当时进步的思想家、哲学家一样,在群体性的社会领域内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宗法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批判,在个体性的人生范围内对封建禁欲主义进行了力度不等的抨击和反拨。他

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人文精神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资源,特别对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问题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中重人伦轻个体的缺陷有所校正,通过小说创作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所有这些,都充分昭示了作为民族精神纪念碑的小说文体所具有的巨大艺术容量。

一、贬君叛道

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根本的特征。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制造了“君权神授”的神学蒙昧主义理论,把皇帝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都把君臣关系放在第一位,要求人民一切听命于君王,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君主。理学家宣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①在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和批判。明代何心隐将五伦中的“友朋”一伦置于其他四伦之上,提倡以友朋之道来处理君臣关系,认为“君臣友朋,相为表里者也”。明末东林党人要求广开言路,主张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公开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主张以“天下之法”代替封建帝王的“一家之法”,通过学校对君权实施监督。何心隐置君臣关系于不顾,“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李贽《何心隐论》)。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论点,

他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平等的,“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唐甄则打碎君主头上的神圣光环,指出“天下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公然宣称“君臣之伦不达于我”(《潜书·守贱》)。这种贬抑和批判君权的思想倾向,同样也体现在当时的小说之中。

首先,明清小说对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提出怀疑和批判,并揭露封建帝王的昏庸无道,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残暴与腐朽,主张无德让有德。

最早对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怀疑的是《三国演义》。罗贯中朦胧地意识到那种“一姓单传”、“传子以嫡不以长,传嫡以长不以贤”的血缘宗法社会的皇位继承原则,无法保证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他渴望冲破血缘宗法制的罗网,让有才有德者来治理天下。小说中多次借人物之口,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上地下,唯有德者居之”等与封建正统观念相悖逆的政治主张。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段话未见诸正史记载,显然出于作者的虚构,实际上表现了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怀疑。《三国演义》虽没有抛弃尊皇尊帝的传统观念,但小说主张良臣择主而事,并对传统的君臣关系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主张用兄弟、师友的关系取代君尊臣卑的主奴关系。刘备与关羽、张飞,是亲密无间的异性结义兄弟;刘备与诸葛亮,是互相尊重的师徒和朋友,他们之

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此外,《封神演义》中周武王和姜子牙之间,《说唐》中唐太宗与徐茂公之间,《英烈传》中朱元璋与刘伯温之间,也同样体现了这种师友关系。一些小说中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限制君权、改革现实政治的主张。《女仙外史》第八十三回《建文帝敕议君臣典礼》,借“建文帝主意”,提出“要臣不太卑,而君不太尊”的观点,说这“就是孟子所云‘天子不召师’的议论”。《镜花缘》中“君子国”的国君有事自己去宰辅家商量,也表达了要求改变君主专制政体中君臣关系的愿望。

明清小说对封建帝制一般都持维护和保留的态度,但其中的佼佼者又都能对昏庸腐朽的帝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有的还主张推翻暴君。《三国演义》指出,造成东汉末年“朝政日非,以至天下人心思乱”这种混乱局势的原因,就是因为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蜀后主刘禅,“溺于酒色,信用黄皓,大臣皆有避祸之心”。施耐庵笔下的宋徽宗赵佶,本是浪荡之徒,“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他登基不到半年,便将“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擢拔为殿帅府太尉。小说多次对赵佶予以贬抑,或曰“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或曰“主上昏昧,奸臣弄权”,或曰“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李逵还口口声声要夺其帝位,由晁盖、宋江取而代之。梁山好汉们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攻州陷府,虽以惩治贪官污吏为主要目标,然而在客观效果上搅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惊动和打击了那位“赵官家”。《水浒传》对

封建帝王的批判固然是不彻底的,但说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未免失之片面。

在《西游记》中,那位总管三界的玉皇大帝被写成一个草包饭桶。他昏庸糊涂,贤愚莫辨,色厉内荏,对下司管束不严。他被一个猴子弄得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只好向西天佛祖求援。捉获孙悟空之后,他下令对其刀砍斧剁,雷打火烧,碎尸万段;下界天竺国凤仙郡侯不小心推倒斋天供献,他便罚全郡三年不雨,致使百姓饿死大半,又显得极端残暴自私。《西游记》中写到的九个人间国度,也大都“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那些国君们不是人妖不分,就是荒淫无耻,残忍暴虐。车迟国“那国王着实昏乱,东说向东,西说向西”,完全听任妖道的摆布;比丘国国王好色无度,以致“精神倦怠,揖让差池,开言时,声音断续”,“眼目昏蒙”。《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中的隋炀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不惜残民虐民,在东京修建宫院十六所,以民间千余名美女充当宫女,在扬州又挑选民间十二、三岁的幼女三千余人供其日夜淫乐。他又征发五百万民工开凿大运河,累死的百姓将近三百万人。为了造龙舟和建迷宫,他又广肆征索,弄得国库空虚,百姓十室九空。在二下江南途中,船偶然搁浅,他不问缘由,将百姓五万人活埋。《金瓶梅》中的宋徽宗“朝欢暮乐,依稀是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金陵陈后主”。作者还尖锐地指出,“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喻世明言》卷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的开头,作者直接地指出嘉靖年间“只为错用了一个奸臣,扰乱了朝政,险些儿不得太平”。这些描写和议论都直接对封建皇帝和朝政进行抨

击和谴责,表明小说作者们对封建皇权的背离倾向。

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之类的诋君毁圣的言论,在明初曾受到统治者的攻击和删削。然而在《封神演义》第六回中,孟子的观点又通过黄飞虎之口被提了出来。《封神演义》揭露了商纣王炮烙忠臣、剖妇敲骨、剜心挖目等种种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指出他的倒行逆施必然导致“天下皆与为仇,天下共叛之”的结果,并提出了“以有道伐无道,以无德让有德”、“君正,则居其位;不正,则求为匹夫不可得”等惊世骇俗的观念,反抗暴君暴政的意识十分强烈。

其次是肯定反抗朝廷的叛逆行为,歌颂草泽英雄。

《水浒传》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草泽英雄作为讴歌的对象,不仅将梁山好汉作为打击贪官污吏的主要力量,而且还让他们“替天行道”,代替昏庸失职的“天子”行使权利,承担起平虏除暴、保境安民的重大职责。近代学者眷秋认为这是作者民权思想的体现。他说:“施耐庵乃独能破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庙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魅力思想,直足令小儒咋舌。民权发达之思想,在吾国今日,犹未能普及,耐庵于千百年前,独能具此卓识。”^②

许多英雄传奇小说都把草莽豪杰作为重点刻画的对象,在他们身上寄托除奸反暴、抗敌御侮的希望。《杨家府演义》中的孟良、焦赞、穆桂英,《隋唐演义》中的单雄信、秦琼、程咬金,《说岳全传》中的牛皋等等,都曾有过落草的经历。牛皋敢于斥骂宋徽宗是“瘟皇帝”,宋高宗是“昏君”。听说张邦昌要陷害岳飞,他便率兵八万杀往金陵。岳飞被害之后,他又发兵为之报

仇。报仇不成，便到太行山落草。宋高宗派人来招安，他当众撕毁圣旨，申言：“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对“盗寇”作了大胆的肯定：“绿林原是大豪杰栖身之所，自古开疆展土，与国家建功立业，屈指多人，‘绿林’二字，何足为异？何足为辱？”

《金云翘传》将“海盗”徐海写成豪侠仗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称赞他“开济豁达，包含宏大，等富贵若弁毛，视俦列如草莽，气节迈伦，高雄盖世”，“宛如天神下界”。《杨家府演义》中的杨怀玉，在屡遭奸佞诬害之后，于黑夜化装强人杀了奸相张茂，率全家去太行山隐居。朝廷派使者威迫他回朝，他不仅不遵依，还历数朝廷之非，义正辞严地指出：“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

《女仙外史》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视为“妖妇”、“淫贼”的起义领袖唐赛儿说成是仙女下凡，嫦娥转世，把她描绘成灭蝗赈灾、惩治贪官、为民除害的英雄和起兵勤王、讨叛诛逆的帝王之师。小说还将在争夺帝位的斗争中被迫逊位的建文帝视为正统，将夺得帝位的燕王说成是叛臣逆子。这与历史上的建文帝改变了乃祖朱元璋对江南地区血腥统治的政策，失位后深得百姓同情与怀念的社会背景有关，也与清初前朝遗民思明抗清的民族情绪不无关系。《女仙外史》还通过人物之口说：“万岁万岁，从来活不到百岁。”“皇帝也有草寇做起的。”还借助于“蝗”、“皇”二字形体上的联系，巧妙地将皇帝与蝗虫相类比，表示了对皇帝的大不敬。《后水浒传》用托生转世之说将北宋的宋江起义和南宋的杨么起义联结起来，将洞庭好汉说成是屈死

的梁山英雄转世,客观上昭示了封建压迫不止、人民反抗不息的主题。小说中的杨么说:“国家丧亡,实因主昏,主昏则奸佞生。”一改《水浒传》中皇帝“至圣至明”、“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的提法,对最高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更为尖锐。杨么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说:“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弟兄,便可学得;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杨么等人最后在岳飞率大军围剿时,一起隐入轩辕井底,表现了与朝廷对抗到底、坚决不受招安的斗争精神。

叛逆精神在神魔小说中也多有表现。《东游记》中的八仙,火烧龙宫,并和天庭统治者相抗拒,两度大败天兵。《南游记》中的华光敢于同玉皇大帝作对,自称华光天王,大闹三界。《后西游记》中的孙小圣,大胆地将森罗殿门“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的对联改为“是是非非地,毕竟谁是谁非?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讽刺官府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封神演义》中的黄飞虎本为商纣的股肱重臣,纣王调戏并逼死其妻,杀死其妹,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出朝歌,投周反商。小说认为天子负臣,臣亦可负君,“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对背弃暴君的行为表示赞赏。

再次是对忠孝节义等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提出怀疑和批判。小说家们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在矛盾,将封建统治的支柱——忠德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水浒传》中的宋江为了对朝廷尽忠,受招安后屡受排挤压制仍处处委曲求全,结果牺牲了梁山好汉内部的兄弟之“义”,葬送了起义事业。诸葛亮在伐魏战争胜利在即的时刻,收到了后主退兵的诏